

回到凯恩斯还是回到熊彼特? *

——基于主流宏观经济学发展历程的理论反思

董 昀

[摘 要]大萧条爆发后,最终占据主流地位的是系统提出摆脱大萧条方案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因无法解释“滞胀”现象而日渐式微。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共同占据主流地位,它们都要对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负责。危机爆发之后,“回到凯恩斯”的声音日渐高涨。但是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只能防止经济深度下滑,并不能带来经济长期繁荣,也不能帮助人们理解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在后危机时代,我们需要“回到熊彼特”,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基本框架来理解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从而找到走出危机的治本之道。

关键词: 凯恩斯 熊彼特经济学 经济周期 宏观经济政策

JEL 分类号: B22 E30 E60

一、引 言

2008 年 9 月,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危机迅速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持续 20 多年的全球经济周期的“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趋势荡然无存,人们关注的话题迅速转变为如何避免“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位于风暴眼的发达国家和处于外围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无法逃避经济下滑的厄运。直至 2012 年初,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仍未走出政府债务危机,失业率居高不下;全球经济面临严重的下行风险,复苏之路依然漫长。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令主流经济学受到了数十年未有的强烈质疑。经济学家们意识到,眼前的这场危机既是一场经济危机也是一场经济理论的危机,只有对主流经济学进行彻底的反思,才能找到金融危机的根源、走出危机。

在这一轮对金融危机的反思浪潮中,除了少数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之外,大多数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乃至银行家都认识到了自由市场制度的局限性,试图探索未来经济 and 经济学发展的新路径。在各种思潮中,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显得尤为活跃。从政府政策角度看,2008 年之后,发达国家纷纷采用被弃用多年的凯恩斯式的财政支出扩张计划刺激经济。从理论思潮角度看,不但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等主流学者明确指出只有“回到凯恩斯”才能走出危机,而且不少非主流学者和媒体评论员也认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是避免世界经济再次陷入大萧条的有力武器。后凯恩斯主义者保罗·戴维森出版《凯恩斯方案:全球经济繁荣之路》,凯恩斯思想研究权威斯基德尔斯基出版《重新发现凯恩斯》。凯恩斯主义大有取代新古典主义再度占据宏观经济学统治地位的趋势。

凯恩斯主义能否帮助我们找到金融危机的病根、带领全球经济走出危机? 本文在回顾大萧条以来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发现,“回到凯恩斯”的思潮在大萧条后曾多次出现过;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只是防止实体经济进一步下滑的治标之策,没有触及导致危机的深层次因素。不仅如此,继承凯恩斯部分思想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甚至是本轮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我

* 董昀,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们需要超越凯恩斯,从经济长期发展的视角入手,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基础;寻找危机根源,找出问题的解决之道。

二、从大萧条到全球金融危机:主流宏观经济学思潮的演变历程

经济危机来临之后的一段时期往往是反思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经济学局限性的时期,也是各种思潮激烈交锋的时期,2008年之后是如此,1929年大萧条之后亦不例外。由于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主义经济学无法解释大萧条,经济学家们要么从非主流的经济思想中寻找灵感,要么直面现象,开创新的理论体系来解释大萧条。事实上,近年来经济学界对危机的各种反思都可以从20世纪30年代找到思想渊源。按照对自由市场经济信仰程度的差异,笔者将对大萧条成因的理论分析划分为四种典型类型:完全不相信市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怀疑市场调节总量功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政府发挥有限作用的芝加哥学派、完全相信市场的奥地利学派^①。

(一)马克思主义与奥地利学派:两种极端

第一种观点来自不相信自由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大萧条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其他形式的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无法兼容的结果。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极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却使得工人阶级和其他普通社会阶层的消费能力无法得到相应的增长,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和劳动者大规模失业。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总需求不足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必须摧毁资本私人占有的制度,让全社会共同拥有生产资料,才能从体制上根本消除经济危机,使生产力获得充分发展。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是将生产资料私有制与自由市场体系放在一起进行批判的。他们认为市场是一种生产领域的无政府状态,是经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解释经济危机和大萧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其主张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但是他们所主张的推翻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办法在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难转化为政府政策,因为消灭私有制的主张损害到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执政党和政府都无法接受。

与马克思主义者截然相反,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是市场经济最坚定的支持者,完全相信自由市场制度的有效性。他们认为大萧条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府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的恶果。米塞斯和哈耶克指出,美联储增加货币供给、人为压低利率的政策一方面扭曲了要素价格,使得资本、劳动等要素出现“误配置”,另一方面在一部分人从中受益的同时导致另一部分人受损。虽然宽松的货币政策给美国带来了20年代短暂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是不可持续的。它只不过是人为压低的利率将资源过多的引入生产性商品领域的投资活动的结果。一旦政府停止货币扩张,或不再人为干预利率,繁荣就会被终结。基于以上逻辑,米塞斯在20世纪20年代就发出了警告,认为当时的经济繁荣不可能持续,将终结于大萧条^②。由于奥地利学派成功地预测到了大萧条的出现,他们的理论观点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奥地利学派把大萧条完全归咎于政府干预,因此,他们开出的药方就是完全放弃政府干预,让市场力量起作用。罗斯巴德对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做了准确的刻画:“走出当前混乱状态的唯一途径是停止通胀政策。虽然这会导致不可逆转的、明显的经济停滞,但是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并且很快就会得到改变。当自由市场开始起作用时,经济会在短时间内强劲复苏”(Rothbard, 1983)。

基于市场力量能够自动干预经济、实现复苏的信念,1929~1932年期间美国总统胡佛认为美国

^① 史库森(Skousen, 2006)采取了类似的分类。

^② 米塞斯在危机过后表示,1926~1929年美国经济的繁荣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人们相信繁荣可以持续。但是,奥地利学派对1929年的大逆转及以后的经济危机并不感到意外(Mises, 1953)。

经济将很快走出萧条^①。因此美国政府在危机中并没有持续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反而仍坚持预算平衡理念,在1931年底决定采取增税政策控制赤字的扩大(Stein,1996)。然而美国和世界经济并没有像奥地利学派和胡佛总统预料的那样在短期内实现复苏,反而陷入大萧条的泥沼中不能自拔: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46.8%,GDP下降了28%,失业率从3.2%增加到25.2%(Gordon,2000)。人们开始意识到,尽管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失误或许是导致大萧条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固守奥地利学派以及其他自由主义者的建议,让政府眼看着经济下滑而无所作为,那么经济最终将无法走出萧条,这将是政府犯下的更大错误。

(二)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与衰落

凯恩斯不像马克思那样把总需求不足和经济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摆脱的困境,他相信自由市场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但他也意识到,在涉及到总产出和就业的宏观经济领域,自由市场制度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像奥地利学派所论证的那样有效率^②。早期的凯恩斯认为那些深信在长期内市场能够自动将经济带回均衡与繁荣状态的古典主义者们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我们没有必要以国家和全体民众长期忍受经济萧条的痛苦为代价,来等待市场自发的缓慢调整。在1936年出版的《通论》中,凯恩斯更进一步地以市场经济中的三大心理规律(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为假设前提,论证了这样的观点:即便从长期看,市场经济系统也未必能够实现自我调整,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在此基础上他系统地分析了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凯恩斯认为社会总就业水平由总产出水平决定,而总产出又依赖于由投资和消费构成的总支出。由于心理、社会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小于1,因此必须依靠投资的增长来弥合消费需求与总产出之间的缺口,也就是说投资应当等于储蓄。但是,在经济衰退时期,人们的预期是不稳定的:在非理性的“动物精神”驱动下,人们对投资的预期收益(即资本边际效率)也是不稳定的,市场当中刺激投资稳定增长的因素太弱,不足以保证充分就业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运用宏观政策刺激经济复苏。凯恩斯观察到,在萧条的环境中通常都存在流动性陷阱,加上投资更多的取决于“动物精神”而非利率,因此单纯依靠货币政策不能使经济系统恢复均衡。由于乘数效应^③的存在,政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够通过数量调节创造额外的收入,把经济从非自愿失业的均衡状态拉回到充分就业均衡。

在1938年以前,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对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本土经济学家就已经普遍认同兴建公共基础设施对降低失业率、稳定经济的积极作用^④。罗斯福新政的思想渊源更多来自美国本土。1938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凯恩斯理论横扫整个美国经济学界,特别是在青年经济学家中产生了巨大影响^⑤。1938年10月,吉尔伯特等七位经济学家共同发表了《美国民主的经济计划》,用凯恩斯理论分析了当时美国经济形

① 在《光荣与梦想》中,曼彻斯特对胡佛总统对危机的判断作了精彩描述:1929年12月,他宣称“形势基本上是好的”。过了三个月,他又说最坏的情况将在60天内结束。5月底,他预言经济将在当年秋天恢复正常。6月,市场急剧崩溃了,但是那时有个代表团前来请他举办公共工程救济失业,他竟还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来晚了60天,萧条时期已经过去了”(曼彻斯特,2006)。

② 根据斯诺登和文(Snowden and Vane,2005)的考证,凯恩斯在大萧条发生之前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清楚地指出了市场制度在调节宏观经济方面的局限性。

③ 必须要指出,乘数概念的发明者并不是凯恩斯,而是卡恩(R.F.Kahn):他在1931年6月出版的《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论证乘数概念的论文。凯恩斯在1933年的《实现繁荣的途径》一书中使用了这一概念。

④ 例如,20世纪20年代美国最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泰勒(F.M.Taylor)的《经济学原理》中指出,萨伊定律只适用于长期,在短期内,“政府通过修路、建房和改善港口环境等措施,可以有效扩大总需求,带来经济繁荣”(Taylor,1925)。

⑤ 萨缪尔森借用如下诗句描述了美国青年学子第一次读到《通论》时的激动心情:“能生活在黎明时光是何等的幸福,若在那时青年人则更胜似天堂”。

势,宣告了凯恩斯学派在美国的形成;凯恩斯学派的成员从1939年起陆续进入政府的决策层(Stein,1996)。更为重要的是,新政已经推行五年,但是萧条并没有结束,凯恩斯理论的出现正好满足了决策者们的需要。它告诉人们,自由市场制度固有的特性使得私人投资无法满足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新政之所以没有能够结束萧条,关键在于政府支出的力度还不够;要实现经济繁荣,政府就必须继续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在经历10年经济萧条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终于在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的刺激下走出了经济危机,实现了充分就业。正是大规模失业的惨痛经历让美国政府十分看重就业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充分就业视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凯恩斯学派的总需求管理主张被政府广泛采用,并统治了20世纪50~60年代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稳定增长、通胀率和失业率较低的良好局面被普遍视为凯恩斯总需求管理政策的结果(杨春学,2009)。

凯恩斯式扩张性宏观政策过份强调拉动投资对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事实上,宽松货币政策刺激形成的私人投资增长会形成新的产能,进一步增加总供给,加剧消费需求低于总供给的矛盾。政府可能不得不反复使用扩张性政策刺激投资。如果不从制度层面着手调整消费率和储蓄率,单纯的扩张性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越来越小,而且货币增发会导致通货膨胀。这种理论上的“滞胀”可能性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西方发达国家成为现实。正统的凯恩斯理论对此束手无策。

(三)新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以及两者的融合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受到广泛重视。他们极大地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认为大萧条和凯恩斯理论错误地将全世界推入了“对自组织的市场体制深重的怀疑中”(Sachs,1999)。但是,与奥地利学派不同,弗里德曼认为有限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只不过这种干预仅仅局限在货币领域,而且政府不能随意的“相机抉择”,只能按规则行事。在《美国货币史》中,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指出,当年正是由于美联储在面对金融危机时没有注入足够的流动性,让货币按照稳定的速率增长,才导致企业大量倒闭,金融危机转化为大萧条(Freidman and Schwartz,1963)。政府只要让货币按照固定速率增长即可,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解决。如果政府干预过度,会产生严重后果。凯恩斯式宏观政策导致“滞胀”危机就是明显的例证。因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总需求管理的方法并不能有效降低自然失业率,反而会导致货币数量增长快于产出增长,引发通胀。芝加哥学派进一步指出,凯恩斯理论之所以出问题,关键在于他们的假设前提与现实不符。通过对抽样调查数据的检验分析和实证研究,他们颠覆了凯恩斯的三大心理假说:消费水平并不取决于当期收入和消费倾向,而取决于长期收入趋势;投资水平并不是由心理上的血气冲动决定的,而决定于人们对于盈利机会信息的充分研究和判断;宁愿持有货币不愿支出的“流动性陷阱”在现代信用制度下也不复存在(王诚,2004)。芝加哥学派的分析让许多经济学家相信,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并不像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差,而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的破坏作用往往大于稳定作用。

通过对凯恩斯理论的系统批判,由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等构成的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①在70年代以后占据了学术界的统治地位,古典经济学相信市场调节的传统重新焕发活力。新古典主义者信奉自由市场制度,以理性预期和市场均衡为假设前提,为宏观经济理论提供了一套坚实的、严格的微观基础。当然,由于新古典主义者否认政府财政政策的必要性,货币政策也只需要长期不变的“单一规则”即可,政府在面对经济波动时基本上不

^① 根据法国学者帕勒日的分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源自20世纪5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货币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内容,70年代至80年代出现的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也可以归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畴(帕勒日,1983)。这些理论的基本思想都是在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和对政府干预效果的反思中形成的。

需要做什么事情,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也就无法为政府宏观政策提供一套系统的指导框架。因此,尽管卢卡斯在 1980 年发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终结》中急于宣告凯恩斯主义的死亡^①(Lucas, 1980)。但就在此时,比新古典主义者更具有工程师气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已经蓄势待发了(曼昆, 2007)。新凯恩斯主义者与新古典主义者一样,承认自由市场制度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也相信市场有一种内在的均衡和稳定,但是他们无法像新古典主义者那样把包括大萧条在内的一切经济周期现象都视为理性人最优选择的产物。新凯恩斯主义者继承了凯恩斯的观点,认为经济波动反映了市场的某种巨大缺陷,政府干预对熨平经济波动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那里借用了一般均衡框架,把偏好稳定、约束和最大化行为作为出发点,运用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对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与宏观经济短期失衡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分析。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共同分享着宏观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只不过新古典主义由于拥有一整套完美的分析框架,在纯理论领域占据支配地位;而新凯恩斯主义者则更热衷于影响政策,在实际政策操作层面更具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并非水火不容。恰恰相反,主流宏观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两种理论体系已经实现了“广泛的融合”^②。在笔者看来,两者的融合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如前所述,从研究方法角度看,新凯恩斯主义者的分析框架来自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只不过这些新古典的外衣被新凯恩斯主义者用于包装新凯恩斯式的观点。第二,从理论研究进展看,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间在理解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形成了某些共识,这一类新模型被称为“新的新古典综合”(Goodfriend and King, 1997)。新的模型从新古典模型那里搬来 DSGE 分析框架,试图刻画理性人在动态过程中的最优决策是如何引起宏观经济波动的。从新凯恩斯模型中,它吸收了工资和价格粘性理论,用以理解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影响产出和就业的机制。第三,从学术观点看,两个学派在宏观政策选择上达成了某些共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20 世纪 80 年代后两个学派都认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保证充分就业上的作用有限,货币政策则有助于实现低的、稳定的通胀率,保证总需求的稳定增长,政府应当将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作为主要的宏观政策手段。大量经验证据也表明,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具有实际效应。

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深刻影响着经济政策的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发达国家普遍放弃了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依靠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运行。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综合运用各种货币供给和利率手段,发挥着拾遗补缺、熨平波动的作用,具有鲜明的新凯恩斯主义特点。这些政策帮助美国经济避免了深度下滑,迎来了宏观经济波动的“大稳定”时代^③(具体数据见表 1)。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的货币政策被主流宏观经济学家推崇备至,格林斯潘被视为经济奇迹的缔造者(相关讨论可参见 Frankel and Orszag, 2002)。

但是,沾沾自喜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没有意识到,正是美联储 2001 年之后的宽松货币政策为这次金融海啸埋下了隐患。2001~2003 年间,美联储为了消除新经济泡沫破灭给美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连续 13 次降息。利率的降低导致大量货币涌入房地产市场,房价不断攀升。由于市场对房价的预期越来越乐观,金融机构对卖房的贷款条件不断放宽;加上金融

① 卢卡斯在该文中说:“在 40 岁以下的优秀经济学家中,已经没有人把自己和自己的研究成为‘凯恩斯主义’了,把某人称作‘凯恩斯主义者’甚至会招来抗议。”

② 这是布兰查德在危机全面爆发之前的 2008 年 8 月份发表的题为《宏观经济学的状况》的 NBER 工作论文中阐述的核心观点。

③ 面对“大稳定”的良好态势,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领军人物卢卡斯在 2003 年度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主席演讲中甚至宣称,“防止经济衰退的核心课题已经被攻克了”(Lucas, 2003)。

表 1 美国 1950~1999 年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

时段	1950~1959 年	1960~1969 年	1970~1979 年	1980~1989 年	1990~1999 年
GDP 增长率					
平均值	4.18%	4.43%	3.28%	3.02%	3.03%
标准差	3.89%	2.13%	2.80%	2.68%	1.56%
通货膨胀率					
平均值	2.07%	2.33%	7.09%	5.66%	3.00%
标准差	2.44%	1.48%	2.72%	3.53%	1.12%
失业率					
平均值	4.51%	4.78%	6.22%	7.27%	5.76%
标准差	1.29%	1.07%	1.16%	1.48%	1.05%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和商务部网站。

领域的微观监管不断放松，大量复杂的金融创新产品出现，许多贷款机构借助这些金融衍生品来包装那些没有信用记录的低收入者的房贷，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事后来看，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只不过是放松管制政策的帮助下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泡沫替代了 IT 行业的泡沫而已。因此，宏观领域的新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和微观领域的新古典主义“放松管制”的产业和金融政策都要对本次金融危机的发生负部分责任。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思潮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美国政府一方面动用财政资金向濒临倒闭的大型金融机构注资，以增强其流动性，稳定其信用等级，阻止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另一方面出台了 7870 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力图用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削弱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托住有可能再度滑入大萧条深渊的美国经济。

凯恩斯经济学诞生于大萧条之中，带有明显的危机经济学性质，其主要政策含义就是政府在经济出现衰退时动用各种可用的政策工具稳定总需求，减少人们面对的不确定性，使得市场中促进私人投资和消费自主增长的各种因素得以复苏。据此看来，财政支出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本来就是凯恩斯经济学中应有之义。此外，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救助是确保信贷市场复苏、防止“流动性陷阱”出现、保证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前提条件。由以上分析可知，美国政府 2008 年之后采取的政策措施具有典型的凯恩斯式风格。

金融风暴的全面爆发，让主流宏观经济学的过度自信遭受到从未有过的强烈冲击。经济学界展开了全面的理论反思^①。这些反思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再度重视凯恩斯的经济思想。面对危机之后政府干预宏观经济力度加大、财政支出政策重新成为主要政策手段的现象，许多主流和非主流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凯恩斯的幽灵又回来了，他们为凯恩斯的胜利回归而欢呼。凯恩斯的思想是复杂的多面体，在“回到凯恩斯”的浪潮中，不同的理论家抓住的是凯恩斯思想的不同侧面。

首先，从对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上看，以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强烈质疑自由市场制度的有效性，批评主流宏观经济学过于相信市场，甚至连新凯恩斯主义者也努力将自己对新古典传统的偏离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Krugman, 2008），这直接导致主流经济学忽视了对泡沫和危机的分析。克鲁格曼等人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仍然是人们理解衰退和萧条的最好理论框架，只有让政府运用各种手段积极干预经济，才能克服市场的无效率、走出危机。

^① 吴易风(2010)对西方经济学界金融危机后的思潮动态进行了详尽的跟踪和评述。

另一部分主流经济学家着重反思以往宏观政策操作中只关注通货膨胀目标、过分倚重货币政策的倾向。比如布兰查德(Blanchard et al, 2010)认为,本次危机让经济学家想到除了货币政策之外,政府的工具箱里还有财政政策、监管政策等多种工具,政府需要同时关注产出的构成、资产价格的走势、杠杆化水平等多个宏观变量,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保持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双稳定。费尔德斯坦(Feldstein, 2009)对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表示赞同,并对萧条期财政政策的框架提出了具体的设计。林毅夫(Lin, 2009)提出,不仅需要“回到凯恩斯”,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要“超越凯恩斯”,利用积极财政政策,投资到可以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领域。这种投资,短期是创造就业岗位、创造需求,从长期来讲,也将提高潜在增长率、增加税收。

此外,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抓住了真实世界的某些关键性特征:(1)人们在决策时并非是完全理性的,而是有着非理性的“血气冲动”;(2)危机中的世界是不确定的,市场自发的调节不能使支出达到保证充分就业的水平;(3)不确定的真实世界往往难以用精确的数学模型进行刻画,经济学理论往往需要在精确性和有用性之间进行取舍^①。以上这些特征正是新古典主义者的理论模型中所忽略的东西,这直接导致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无法解释真实世界的许多重要现象。

从总体上看,金融危机爆发后,凯恩斯主义者的主张得到了广泛关注。凯恩斯经济学在凯恩斯本人逝世 60 多年后又重新被人们所重视。经济学界正根据新的现象对凯恩斯理论进行修正和拓展,以便能够更好地理解危机后的宏观经济现象。

三、凯恩斯理论的局限性

毫无疑问,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对于熨平经济波动、避免大萧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与 1929 年大危机相比,最大的差别就在于:1929 年经济学家还没有创立宏观经济学,不知道如何通过政策手段稳定宏观经济,而本次危机出现时,在大萧条的腥风血雨中诞生的宏观经济学已经发展了 60 多年,政府在发挥“拾遗补缺”、“多退少补”的基本作用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知识。在这些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指导下,凯恩斯所主张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在危机后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避免了 1929 年那样的经济大崩溃的再度发生。

但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作用也仅仅是降低经济波动幅度、避免大萧条而已。它不能解释和解决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所有问题。

首先,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它不解决长期经济增长问题,不解决金融市场等微观配置效率问题,也不解决制度问题,它只解决短期内经济稳定增长的问题(樊纲, 2001)。当宏观政策成功防止了经济深度下滑、保持了经济平稳运行态势后,它的任务就完成了。它不能保证经济在后危机时代一定能够高速增长,也不能保证金融危机不再发生。

第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也有代价。扩张性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容易在不解决深层次问题的同时滋生虚假的繁荣,向市场注入过多通胀因素,扭曲市场信号、滋生经济泡沫,并延缓经济结构、制度安排等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最终导致新的宏观经济问题出现。70 年代的“滞胀”和导致本次危机的房地产泡沫就是最鲜活的案例。新凯恩斯主义本身就是此次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我们怎么能完全依靠它来走出危机、避免危机的再度发生呢?凯恩斯主义政策在金融危机后发挥的作用仅仅是当金融危机传导到实体经济层面时,避免实体经济的衰退而已。如果过度使用短期政策,可能会带来长期的负面效果。正是看到了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弊端,危机爆发后,

^① 这些特征在斯基德爾斯基所著的《凯恩斯传》、《重新发现凯恩斯》中有详细描述。

反对政府救市和扩大支出的声音不绝于耳。先有 2008 年 9 月 122 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美国国会，反对出台大规模救市方案，后有 2009 年以三位诺贝尔奖得主领衔的 300 多位经济学家联合签署反对扩大政府开支的声明。这些来自经济学界的批评影响到了政府决策层。2009 年之后，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允许大型金融机构回购政府持有的优先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的首脑也公开表示不再支持扩大政府开支的政策。

在讨论凯恩斯式宏观政策是否应当退出时，我们不当把问题简单看作是政府与市场之争。政府和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也都有着各自的局限性，政府的不当干预和金融市场的自由放任都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在后危机时代，我们需要抛弃市场/政府二分法的思维定势，探究金融危机的病根，才可能避免下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发生。

第三，凯恩斯经济学本质上是危机经济学，带有鲜明的管理性、对策性思维的特点，目标在于帮助人们走出深度经济衰退的困扰，它本身并没有为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经济周期现象提供完整的理论框架。因此，我们无法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找到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所在，只能在问题出现后依靠它来避免最糟糕结果的出现。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目的在于解释世界，找到经济现象背后的那个可变的外生变量。凯恩斯的理论并没有实现这个目的。这或许与凯恩斯本人的研究风格有关。从基本信念上来看，凯恩斯和古典主义者一样，将繁荣的“正常”经济假设为处于静态平衡之中的经济，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然而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却总是处于动态的非均衡状态之中。凯恩斯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没有对结构性的变化和创新等根本经济现象作出合理分析，简单地把它看作经济系统之外的偶然事件，而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往往正是这些被视为外部冲击的因素。由此看来，我们需要突破包括凯恩斯主义在内的均衡经济学的禁锢，才能完整系统的理解经济波动。

第四，货币和金融在凯恩斯经济学中被看作政府控制经济的政策工具，决定了总需求以及宏观经济状况。政府通过控制货币、信贷、开支和税收，就可以保证经济体系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本次金融危机的发生表明，发达的金融体系未必是实现经济均衡稳定增长的保证，反而可能是经济波动的根源所在。我们需要跳出凯恩斯的框架审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综上所述，“回到凯恩斯”在短期内对世界经济走出危机是有益的。但是从长期看，凯恩斯的理论不能帮助我们理解金融危机、理解经济周期，甚至还有很大的副作用。我们需要运用一套具有长期视角的动态理论框架来反思金融危机，熊彼特的创新发展理论正是我们需要的框架。

四、回到熊彼特

凯恩斯与熊彼特同样出生于 1883 年，同样经历了大萧条。但是两人的生活经历完全不同，导致他们各自秉持的基本信念、方法论和学术风格差异很大。首先，凯恩斯在英国中上层社会成长，享受着英国鼎盛时期的稳定和繁荣，因此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理想的经济运行过程是平稳的、均衡的。熊彼特的一生则与稳定无缘。他的青年时代在面临分崩离析的奥匈帝国成长，一生在五个国家的九个城市生活过，常年经历着各种类型的“创造性破坏”的冲击。在熊彼特看来，世界的常态就是巨大的、非连续的变化。

其次，凯恩斯长期为政府部门工作，关注的重点是短期的政府政策，注重提出解决当下问题的办法。凯恩斯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是在寻找对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熊彼特则是更为纯粹的理论家，致力于解释世界，极少给出政策建议^①。熊彼特理论对改造世界的指导作用仅仅是暗含在其理论结论及其推论中的。

^① 唯一的例外是 1925~1932 年之间熊彼特写过一系列关于德国经济政策的非学术文章(麦克劳,2010)。

第三,凯恩斯擅于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抽象出核心的变量,并能够运用简练的语言清晰地论证、传播他自己构建的逻辑^①。熊彼特的抽象能力和传播理论的技巧不如凯恩斯,但是知识面要宽于凯恩斯,善于在长期的视角下从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多个维度综合考察现象的各个方面。

基于以上差异,凯恩斯与熊彼特对大萧条的分析截然不同:凯恩斯重视短期、重视需求、强调静态分析、采取以政府宏观政策为基础的从上到下分析视角;熊彼特重视长期、重视供给、强调动态分析、采取以企业家、企业和产业为基础的自下而上分析视角。

具体而言,凯恩斯把大萧条视为危及资本主义体系生死存亡的灾难,提出了一套走出大萧条的政策框架。在凯恩斯看来,大萧条是资本主义世界走向停滞的表现:企业的投资机会减少、金融体系储备的资金无法发挥作用、失业率持续增加、收入增长的停滞难以支持必要的消费。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刺激经济才能避免停滞,恢复繁荣的景象。尽管凯恩斯在理论上有根本的缺陷,但是由于他在危急时刻提供了一份有效的走出萧条的“作战方案”,满足了当时人们终结萧条这一最大愿望,因而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占据了主流地位。与凯恩斯的停滞理论相反,熊彼特把萧条和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动态过程的一部分。他并没有提出政策建议,而是综合运用历史、理论和统计方法,以他自己的创新发展理论为基础,对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周期现象进行了全面的分析(Schumpeter, 1934; 1939)。由于熊彼特的分析过于琐碎、冗长,加上其研究风格无法满足当时人们的需要,他的著作问世后几乎无人问津。直至今日,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还没有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注意。但事实上这两套理论体系是互补的,凯恩斯理论适用于短期内指导政府宏观政策,熊彼特理论适用于长期内解决制度性、结构性问题,实现经济繁荣。经济学家如果能够“回到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基本框架观察本次金融危机,将会得到有益的新启示^②。

第一个启示是,“大稳定”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已经为人类找到了一劳永逸地克服经济周期的办法。在熊彼特的理论体系中,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经济周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的现象。企业家把新发明引入经济体系的过程带来了经济繁荣。随着新进入者的增加和竞争的加剧,商品价格趋于下跌,企业获利机会减少,进而导致银行信贷收缩,经济体系由繁荣转入衰退。经济发展是在企业家推动的一轮又一轮创新活动中沿着“创造性破坏”路径实现的。熊彼特还根据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v)的研究,把工业革命以来(1780~1950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时间长度约半个世纪的长周期,每一个长周期都是由于企业家把重大的新技术引入经济系统而产生的。据此看来,只要企业家在成批涌现,那么经济就会在不断波动中实现增长;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完全熨平经济波动。

从长周期的视角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第三次科技革命^③浪潮的推动下,原子能、航天、微电子、计算机网络和生物工程等新技术被引入经济体系中,西方发达经济体进入了新一轮的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到了20世纪末,这一轮经济周期的繁荣期已过,其突出表现是2000年之后美国IT泡沫破灭、2001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接近零。美联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并不能改变长周期的规律,只是人为延缓了萧条的到来,造成了“大稳定”的幻象^④。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打破了经济周期已经被人类驯服的神话,也充分暴露了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的副作用。在对本次危机的反思中,以科尔奈为代表的资深学者和以阿西莫格鲁为代表的年轻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经济

① 阿兰·曼在《魔鬼凯恩斯》一书中描述到,凯恩斯经常熟练的运用“由激昂鲜明的词汇、匪夷所思的隐喻和似是而非的对比所组成的”语言推销自己的理论观点(曼,2009)。

②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集中的体现在《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周期》两本著作中(Schumpeter, 1934; 1939),本文不再赘述。

③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继蒸汽机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它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70年代达到高潮。其主要标志是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

④ 尽管“大稳定”现象始于1984年(Kim and Nelson, 1999),但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界对它的研究却是在2000年之后。

学界需要从熊彼特的企业家与创新理论中汲取营养，才能真正理解市场体系运行的本质特征，理解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成因(科尔奈,2011;Acemoglu,2009)。

根据长周期理论,本次全球经济的剧烈波动实际上是主要发达国家创新动力衰竭、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结果。由此看来,面对经济周期现象,人类还没有一剂万能的灵丹妙药;最终走出危机需要采取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办法。一方面,政府需要继续运用凯恩斯式的扩张性宏观政策,消化过剩产能,极力避免经济的深度衰退,为制度层面的调整提供稳定的宏观环境,这类政策的作用是拾遗补缺、雪中送炭、保持宏观稳定。另一方面,政府也必须在供给面下功夫,综合运用熊彼特式经济政策,通过推进劳动力市场、金融结构、产业政策、科技创新体系等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促进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经济增长点的培育,通过创新引导新的消费需求,最终摆脱危机。这类政策的作用是鼓励创新、走出萧条、促进繁荣。

第二个启示是,金融创新不等于创新,任何金融创新都应以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为目的。在熊彼特的框架中,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金融体系的发展也应该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为根本目的。熊彼特认为,银行信贷就有如一道命令要求经济体系去适应企业家的需要,从而为“企业创新”^①提供生产要素,为从完全均衡状态的简单循环流转状态中产生经济发展创造了外部条件。

进一步地说,在熊彼特理论体系中,金融体系与企业创新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金融体系提供的信贷是企业创新的前提,而企业创新的实现又是金融体系得以持续运行的基础条件。首先,金融体系的信贷本质就是为了授予企业家以购买力而进行的购买力创造。企业家拥有了货币或支付手段之后,就能够把生产要素从它们原先的用途中抽取出来,按照需要加以利用,从而迫使经济体系进入新的渠道,这一过程也就是企业家实现创新的过程。其次,只有当创新成功实现之后,才能为银行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流,也就是利息。也只有当对企业家对现有购买力的控制意味着能为企业家带来更大的未来购买力时,借贷才能变成工商业日常事务的一部分,银行利息才能不间断地产生。

令人遗憾的是,熊彼特之后的创新经济学研究者没有对金融资源配置与创新的关系展开清晰的分析,金融与创新成为一个被经济学家长期忽视的研究领域(O'Sullivan,2004)。当代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前辈一样,忽略金融的作用,“银行和金融文献在货币和信用文献中是一隔离车厢,正如后者在一般经济学文献中是一隔离车厢那样”(熊彼特,1954)。有学者在思考本次危机后宏观经济学发展方向时指出,当代主流经济学认为金融市场只是一个余兴表演,从来不是主角,因此可以将它处理成外生变量(张晓晶,2009)。

“金融创新”这一概念是金融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创造的,它与经济学中的“创新”或者说“企业创新”概念没有任何联系,只不过是金融机构为了逐利而设计的新型金融衍生工具而已。金融学者在设计这些工具时并不在意这些所谓“金融创新”活动能否优化资源配置。当人们能够利用这些工具为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服务时,它们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创新”。但是当金融资产在这些工具的推波助澜下脱离实体经济不断自我膨胀时,就会形成资产泡沫,反过来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次金融危机就是一次深刻的教训。我们需要重温熊彼特的理论,不要过度迷信金融市场的有效性,而要努力的让金融创新为财富的创造和生产率的提高服务。

第三个启示是,企业家精神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政府政策应鼓励企业家才能配置到生产性领域。在熊彼特的世界里,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创新,也没有经济发展。鲍莫尔发展出了一个扩展的熊彼特模型,指出制度结构决定着企业家精神的配置方向。如果企业家精神配置到生产性

① 经济学中唯一具有完备定义的“创新”概念是“企业创新”(王诚,1999),它是企业家首次利用发明、进入市场、获得利润的过程。

领域,就能够促进创新与经济增长;如果配置到非生产性的寻租、破坏等领域,则会导致经济停滞(Baumol, 1990)。按照这一套框架来分析,美国长期以来对金融市场的放松管制和实体经济创新乏力导致金融部门的报酬远高于实体部门,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越来越多地被配置到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中。企业家配置结构的变化一方面进一步阻碍了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实施,另一方面助长了金融资产价格的进一步膨胀。由于金融部门的发展不可能长期脱离实体经济的基本面,其结果必然是经济增长的停滞和资产泡沫的破灭。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培育企业家精神,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的发展,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市场运行,从而降低企业家的创业壁垒,增加企业家在实体经济领域的收益。奥巴马政府推行的新能源革命就是一项有可能带动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的长远战略,是鼓励企业家进军新领域的有益尝试。

第四个启示是,主流经济学家需要直面真实世界中的根本现象。熊彼特是一位执著于追求真理的经济学家。他也曾追求过精确的、富有美感的理论框架,但是当他发现经济社会中充满太多不确定性、太多变量时,他意识到了经济学永远也做不到无法象物理学那样精确。他在职业生涯的后期放弃了这样的诉求,集中精力思考资本主义动态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创造性破坏、创新、企业家精神。在今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如果你过多关注这些无法模型化的问题,那就很可能被边缘化。主流经济学切断了自身与历史,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联系,关注那些小的、易于用数学处理的问题。主流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步骤是先构建数理模型、再对模型进行计量检验。当面对金融危机之类的无法精确刻画的重大问题时,主流经济学显得束手无策。其根源在于主流经济学家的精力大多放在了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上,他们无暇去洞悉人类行为的动机,无暇从长期的历史视角考察现象的来龙去脉,甚至无暇阅读前辈经济学大师的经典著作^①。这样的研究成果难有历史的穿透力和现实的洞察力,也自然无法回答那些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了。

五、结语

德鲁克(Drucker, 1983)对凯恩斯和熊彼特两位大师的评价很好的代表了本文的观点:“凯恩斯和熊彼特再现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家的冲突——天才的、聪明的、锋芒毕露的巴门尼德,和动作迟缓、面目丑陋却智慧无比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对话。战争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天才、更聪明。与此相反,熊彼特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大智慧。小聪明风云一时,大智慧永垂不朽。”

回到熊彼特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抛弃凯恩斯。在问题重重的后危机时代,“天才的、聪明的”凯恩斯仍然在为我们提供避免大萧条、稳定经济的止痛药,它可以帮助各国规避深度衰退、大规模失业、收入负增长这一类最糟糕的结果。而长期被主流经济学家忽略的“智慧无比”的熊彼特为我们开除的则是强身健体的长期处方,它无法在短期内拯救人类于危难之际,却可以激发人的创造力、从经济体系内部产生繁荣的根本动力。凯恩斯的思想在帮助我们度过了最艰难时刻之后,就需要适时退出;此时我们更需要的是回到熊彼特,采取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通过创新来培育新产业、促进经济发展,这才是摆脱危机的治本之道。

参考文献

樊纲(2001):《经济学中的“短期”与“长期”问题》,《经济研究》,第6期。

^① 新增长理论的奠基人罗默在一次访谈中就曾表示从未认真读过熊彼特、凯恩斯等人的著作(Snowden and Vane, 2005)。

- 方福前(2010):《凯恩斯“复活”:是福是祸?》,《中国社会科学报》,12月28日。
- 康德拉季耶夫(1986):《经济生活中的长波》,载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商务印书馆。
- 科尔奈(2011):《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于短缺和过剩的市场理论研究》,《比较》,第57辑。
- 勒帕日(1983):《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 麦克劳(2010):《创新的先知:约瑟夫·熊彼特传》,中信出版社。
- 曼(2009):《魔鬼凯恩斯》,中信出版社。
- 曼彻斯特(2006):《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社会实录》,海南出版社。
- 曼昆(2007):《宏观经济学家们的双重角色》,《比较》第29辑,中信出版社。
- 史库森(2006):《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上海人民出版社。
- 斯基德尔斯基(2006):《凯恩斯传》,三联书店。
- 王诚(1999):《增长方式转型中的企业家及其生成机制》,《经济研究》,第5期。
- 王诚(2004):《中国宏观经济分析面临新挑战》,《经济研究》,第11期。
- 熊彼特(1995):《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
- 吴易风(2010):《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经济学动态》,第3、4期。
- 杨春学(2009):《国际金融危机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研究》,第11期。
- 张晓晶(2009):《主流宏观经济学危机与未来》,《经济学动态》,第12期。
- Acemoglu, D.(2009):“The Crisis of 2008: Lessons for and from Economics”, *Critical Review*, 21, 185–194.
- Baumol, W.(1990):“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893–921.
- Blanchard, O., G. Ariccia and P. Mauro(2010):“Rethinking Macroeconomic Policy,” *IMF Staff Position Note*, SPN/10/03, February 12.
- Druker, P.(1983):“Schumpeter and Keynes,” *Forbes*, May 23.
- Feldstein, M.(2009):“Rethinking The Role of Fiscal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No.14684.
- Frankel, J.A and R. Orszag,(2002):*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90s*, MIT Press.
- Freidman, M. and A. Schwartz.(1963):*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iersch, H.(1984):“The Age of Schumpet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103–109.
- Goodfriend, M. and R. King (1997):“The 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 and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31–283.
- Gordon, R.(2000):*Macroeconomics*, 8th ed., New York: Addison–Wesley.
- Keynes, J.(1936):*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 Kim, C. and C. Nelson(1999):“Has the U.S. Economy Become More Stable? A Bayesian Approach Based on a Markov–Switching Model of the Business Cycl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1, 608–616.
- Krugman, P.(2008):“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 Lin, Y. (2009):“Beyond Keynesianism: The Necessity of a Globally Coordinated Solution”,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Agriculture)*, 31, 14–17.
- Lucas, R.(1980):“The Death of Keynesian Economics,” *Issues and Ideas*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 Winter, 18–19.
- Mises, L.(1953):*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O’Sullivan, M. (2004):“Finance and Innovation”, in Fagerberg, J., O. Mowery and R. Nelson, (ed), *Oxford Handbook of Innov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thbard, M.(1983):*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4th ed, Richardson & Snyder.
- Sachs, J.(1999):“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A Brief Hist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15, 90–101.
- Schumpeter, J.(1934):*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mpeter, J.(1939):*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New York: McGraw–Hill.
- Schumpeter, J.(1942):*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Snowden, B. and R. Vane(2005):*Modern Macroeconomics: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 Stein, H.(1996):*The Fisc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policy in Pursuit of Reality*, AEI.

(责任编辑:周莉萍)